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黄晓云.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生态正义话语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45(6):71-76.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生态正义话语研究

黄晓云

(长江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现代社会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催生了生态正义话语。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揭示生态正义话语的缘起,对比分析生态伦理学的生态正义话语、“环境正义运动”的生态正义话语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话语等三种主要生态正义话语的分野,进而提出生态正义话语的导向,对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历史唯物主义;生态正义;生态文明;生态正义话语

分类号:B8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2)06-0071-06

现代社会生态环境问题在严重危及人类生产、生活的同时,还带来了生态权利不平等、生态义务不对等以及承担生态后果不公正等一系列生态非正义问题。追求生态正义成为解决生态矛盾的普遍诉求,生态正义话语得以产生。然而,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和不同利益的驱动,众说纷纭的生态正义话语严重干扰了人们的生态认知和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科学地反思当前生态正义理论与话语。由此,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剖析生态正义话语,进而构建“具有普遍适用性、最大包容性”^{[1](PX)}的生态正义话语,对推进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生态正义话语的缘起

生态正义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和谐发展的道德准则,反映的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们对人类、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关系所持的价值观的反思,实质上是关于生态资源的享用和承担相应义务的道德准则。生态正义话语是生态正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是处在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对生态正义的认知及其

言说方式。话语的产生有其现实背景和利益诉求,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为客观地探寻生态正义话语产生的前提、根基和核心诉求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

(一)生态环境现实是生态正义话语的前提

现代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在创造舒适便利生活的同时,也破坏了自然生态环境。20 世纪 30 年代至 80 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当今世界的生态环境问题更是层出不穷:雾霾天气频现,水污染严重,土地退化,森林面积减少,生物多样性下降……这些问题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困扰。话语是现实的表达和理想的诉求,生态环境现实是生态正义话语得以产生的前提。曾任职于美国渔业与海洋生物服务局的生态文学家蕾切尔·卡逊于 1962 年出版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讲述因人们滥用杀虫剂等化学药品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破坏了生态系统平衡,并由此给人们带来伤害。这本著作提出的警示可谓振聋发聩,“未来的历史学家或许会为我们面对利弊的时候所具有的如此低下的判断力而感到震惊”^{[2](P9)},也由此唤醒了人们从“征服自然”到“保护自然”的意识觉醒。西方生态正义话语的讨论

收稿日期:2022-06-03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生态正义的理论与实践研究”(20Y028);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0YJA710014)

作者简介:黄晓云(1975—),女,湖北安陆人,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生态文明研究。

与研究拉开帷幕。1972年的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呼吁全世界共同关注人类的生存环境则促进了全球生态正义话语的兴起。

(二)生态利益冲突是生态正义话语的根基

生态环境严峻的现实突出表现为生态利益冲突,各种生态权责分配不均衡导致的生态利益冲突不仅体现在不同阶层群体之间,也表现为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可以说,没有生态利益冲突,也就无所谓生态正义话语。正是享用生态权利和承担生态责任的不对等,催生了生态正义话语,奠定了生态正义话语根基。

1.不同阶层群体之间的生态利益冲突

利用自然是“人类”普遍的生存方式,但不同阶层群体利用自然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是不对等的。高阶的强势群体往往能享受更好的生态环境,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优美的生态空间,却并未履行相应的环境保护及生态补偿义务。事实上,强势群体对于自然的利用不仅仅是出于生存目的,更多的是为了增加财富。达到增加财富的目的进一步加剧了对自然的侵蚀和环境的破坏。此外,强势群体拥有更多的资源,容易通过产业转移、居所搬迁、生态建设等方式规避生态破坏的后果。而弱势群体不得不忍受环境破坏的恶果,除了抗议,他们别无选择。随着科技和工业资源聚集,强势群体占据特权而弱势群体受到压迫伤害的问题日益突出。不同阶层之间的生态利益冲突引发了人们对生态正义的广泛关注与探讨,这成为生态正义话语产生的社会根基。如在美国有色人种因抗议垃圾等有害物质聚集在他们的生活社区给健康带来伤害,引发了声势浩大的“环境正义运动”。

2.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生态利益冲突

资本主义主导的全球化使得生态利益的“马太效应”尤为明显。发达国家和地区凭借科技和资本的优势,利用垂直分工的全球产业体系,将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转移到环境政策法律标准相对宽松的发展中国家生产,利用全球化的经济贸易机制,享用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源。而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亟需解决发展的问题,倾向于靠消耗自然资源来换取经济的发展。由于科技不发达,自然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发展中国家环境破坏愈加严重。但是,发达国家和地区往往并不需要为此承担相应的生态责任。不仅如此,发展中国家还得承受发达国家高额的生态税。这种国际分工和产业格局加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生态利益冲突。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和地区在生态权益和责任上的不平等地位催生了“生态殖民主义”话语。对生态殖民主义的批判丰富了生态正义话语的内容,拓展了生态正义话语的范畴。

(三)美好生态诉求是生态正义话语的核心

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推动了生态正义话语的发展,成为生态正义话语的核心。

1.物质生活的丰富催生了美好生态的诉求

早期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足使得人们更关注满足物质生活资料的低阶需要,无暇顾及其它高阶需要。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进步,人们的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已经基本得到满足,物质生活变得愈加丰富多彩。物质生活的丰富激发人们产生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种美好生活既包括对物质的诉求,也更强调对美好生态的诉求。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充分体现出物质生活的满足会催生美好生活的诉求这一论点。但是工业化发展模式的本质基本上都是以“自然的消耗”换取“经济的积累”,物质生活丰富,生态环境却恶化,美好生态转而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可以说,正是物质生活的丰富催生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诉求。

2.文化生活的丰富唤醒对自然的审美想像

对自然的理解和想像,除了存在着作为生活的自然和作为生存的自然,还存在着作为精神追求的自然,“任何关于自然(环境)的想像都是基于某一地理位置、某一文化传统的想像”^[3]。物质生活的丰富进一步催生了更深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为满足人们对精神文化的需求,社会文化生活向多元化深层次发展,以充实人们的文化生活为目的而开展的各种文化活动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这种文化的交流与碰撞不仅丰富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在交流的过程中也丰富了人们的感性经验,增强了人们对生活环境和艺术的敏感性,促使人们萌发艺术审美意识,从而唤醒了人们对自然的审美想像。虽然自然的审美想像具有某种“中产阶级的偏见”,但也是人们物质文化生活丰富的体现。

3.生态正义是美好生态的应有之义

美好生态描述了理想的生态环境状态,生态正义则界定了实现美好生态的原则和途径。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生态正义是美好生态的题中应有之义。首先,二者都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

记在 2018 年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的讲话强调,“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4](P359)}。美好生态要求生态利益能够惠及全民,平等地满足人们对自然生态的生存价值诉求和生活价值诉求,有差异性地满足人们对自然生态的精神价值诉求。其次,美好生态的实现有赖于坚持生态正义的原则和途径。生态破坏最重要的原因是不同阶层群体之间和不同国家地区之间的生态非正义,美好生态的实现要避免由于享有生态权利和承担生态义务不对等而致的生态破坏。

二、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生态正义话语的分野

生态正义话语研究内容较为丰富。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评析生态伦理学的生态正义话语、“环境正义运动”的生态正义话语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话语三种主要生态话语体系,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认识西方生态环境的现实及其背后的利益诉求。

(一)生态伦理学的生态正义话语

生态伦理学生态正义话语的主体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他们从自身需求出发,关注对自然的审美想像,对自然生态的追求具有“中产阶级的偏见”。生态伦理学生态正义话语的主要内容是“确定人对自然界的道德义务”,这是“生态伦理学的根本目的”^{[5](P39)}。他们对自然价值的态度大致可划分为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两大派别。基于此,生态正义话语也呈现出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两个派别。其中,在人类中心主义阵营中,诺顿以对人的“感性意愿的满足为标准”区分强人类中心主义和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的所有感性意愿都应得到满足的理论是一种强人类中心主义,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弱人类中心主义主张对感性意愿本身进行合理性的评判,对人的合理的感性意愿给予肯定,对不合理的感性意愿加以限制^{[6](P310~311)}。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非正义话语就其实质而言,其本体论基础是形而上学的理性至上,具有迷信人类理性色彩,有悖于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感性活动”^[7]的前提。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正义话语是在批判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正义话语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享有道德关怀的资格不仅仅是具有理性的人类,非人存在物同样享有道德关怀的权利。非人类中心主义以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罗尔斯顿的自然价值论以及奈斯

的深层生态学为代表。他们一致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每种生物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体系,应当享有道德关怀的权利。由此可见,非人类中心主义生态正义论将现代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为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认为人对非人类存在物非正义价值观造成了生态环境问题。

生态伦理学的生态正义话语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一方面它拓展了伦理的边界,将伦理关系引申到了人与自然之间;另一方面,它揭示了造成生态危机的价值观根源,拓展了伦理学的社会功能。但是,生态伦理学的生态正义话语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分析法,忽视了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支配的全球权力之间的关系”,“把生态问题简单归结为价值观的问题”^{[8](P109)},将现实社会的人抽象为统一的“人类”,回避了现实社会的矛盾,是一种纯学理上的无关痛痒的伦理价值层面的探讨,难以产生有影响的实际效果。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中,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决定人与自然的关系,要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首先应实现社会的正义与和谐。人是现实的、具体的人,社会的正义与和谐应充分考虑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处于不同环境中的人对环境的诉求不同,而不能仅仅用抽象的“人类”二字粗略的概括。

(二)“环境正义运动”的生态正义话语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后,由于生态伦理仅仅在伦理价值层面上进行探讨与研究,对生态环境现实问题缺乏实践支撑而陷入了停滞期。环境保护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促使“环境不公”问题频出,助推了“环境正义运动”在全球范围内的兴起。简言之,“环境正义”是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特别是弱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环境保护中权利与义务不对等的议题。“环境正义运动”在实践中将生态正义话语从生态伦理层面引向了社会层面,并在社会层面逐步拓展了生态正义话语的论域,极大地增强了生态正义话语的现实影响力。

1.环境生存正义话语

环境生存正义话语的主体最初主要是社会底层民众,即弱势群体。他们往往依赖有限的环境资源生存,生活空间相对狭小、固定,且没有足够的资源避免环境污染的威胁。这些弱势群体既有发达国家的底层民众,也有不发达国家的穷人等社会底层的民众。环境生存正义话语的内容是“平等地享有自然赐予的生存权利”。彼得·S.温茨的《环境正义论》中指出,对生存权这一人权的否定是不公正的,

“是人权观点所谴责的”^{[9](P160)}。环境生存正义话语的对象主要是弱势群体所生活社区的卫生环境、工作场所的环境条件等。由此可见,美国的环境生存正义话语就是始源于底层民众对社区周围有害垃圾的抗议。

2. 环境种族正义话语

种族主义最能激起少数族裔的反抗意识,“环境正义运动是在反对环境种族主义的斗争中兴起的”^[10],在环境正义运动中形成了丰富的种族正义话语。环境的典型特征是其公共性。美国黑人经常援引民权法第六款,即受联邦资助的公用设施不得含有种族歧视。环境正义与种族密切相关的事实也引发了学术界的关注,美国开展了多项“种族与环境风险”调查,进而将环境种族正义话语完善成为一系列具有数据支撑的严谨学术话语。较具影响的有美国联合基督教会种族正义委员会于 1987 年公布的《美国的有毒垃圾与种族》报告,其结论认为种族是影响美国有害垃圾处理站分布的主要因素。学术话语因其严肃性,影响更大。在学术话语的影响下,1991 年 10 月 24 日至 27 日,首届美国有色人种环境领导人峰会在首都华盛顿举行,通过了对环境正义具有指导意义的 17 条原则,这些具有政治指导意义的话语进一步拓展了社会正义的外延与内涵,加大了环境正义运动的社会影响。环境种族正义话语以学术话语的形态展现,提高了种族话语的影响力。

3. 环境文化正义话语

随着环境正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和主流环保组织态度的转变,环境文化正义话语成为了环境运动中生态正义话语发展方向。环境文化正义话语的主体不仅限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还包括主流环保组织以及一些政府官员。他们认识到,贫困、种族主义与环境退化密切相关。环境文化正义话语在内容上,不只是一要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环境和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同时还要关注整个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诸如污浊的空气、被污染的水源、有毒物质、病毒等。环境正义话语的对象相应从弱势群体社区生活环境和工作环境扩展到环境卫生科学与技术知识、环境政策法律制度、经济发展与人体健康以及生态安全关系等广泛领域,由此进一步将生态正义问题上升到文化价值的高度。

在环境正义运动中,生态正义话语在不断包容更大的话语主体中拓展其话语内容,逐渐从环境生存正义话语拓展到环境种族正义,进而拓展到环境文化正义话语,其结果是扩大了环境正义运动中的

生态正义话语影响。但是,环境正义运动仅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下寻求社会正义,其效果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对于整个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而言是微不足道的。相反,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生态非正义的严峻现实。

(三)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话语

生态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生态运动中左翼力量的社会思潮,始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为切入点,历史地探索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根源,从独特的批判视角对资本主义技术、消费和制度进行了批判,分别形成了技术使用的非正义话语、消费诱导非正义话语以及制度本质非正义。

1. 技术使用非正义话语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地看,科学技术的革新带来巨大物质财富是毋庸置疑的,但科学技术的革新并不能与科学技术使用的正当性和合理性画等号,科技原罪论的观点仅从科学技术的纯粹价值出发考察生态危机,未能抓住问题的根源。生态马克思主义强调,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理性、非正义地运用科学技术,将其作为追本逐利的工具,最终导致技术、人、自然、人与自然关系的多种异化现状。当资本家为达到逐利目的盲目崇拜科学技术时,它就会成为人们“控制自然”的工具,从而成为威胁自然的强大力量。因此,当科学技术作为工具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非理性、非正义使用时,人对自然的征服与统治也加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统治,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人的异化。

2. 消费诱导非正义话语

马尔库塞曾在批判资本主义时提出了“虚假的需要”这一概念,即“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那些需要”^{[11](P8)}。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人们不再主要关注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更关注商品的符号价值。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就在于资本主义的逐利本性需要不断扩大生产来实现。为了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社会化的高消费来消化,因此就有了商家广告宣传的大肆投入,不断诱导人们产生“需要感”。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这种现象的产生就是资本主义为了维护自身的“合理性”,以异化消费的方式为遮羞布。人们深陷琳琅满目的商品世界无法自拔,早已分不清是“需要”还是“想要”,任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摆弄,不断丧失主体意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生产 and 消费中对人实行了全面控制,但这一控制方式的

结果是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失衡甚至是破裂。

3. 制度本质非正义话语

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问题上,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消费异化都只是具体表现,根源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逆生态性。这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造成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源,更是导致人与自然之间矛盾冲突的根源,是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人类最初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还处在相对稳定的平衡界限中,但随着资本增殖和积累的浪潮狂卷全球,利益的最大化成为资本主义首要目标,扩张特性就成为其维持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内在逻辑。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中就可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为满足自身利润最大化的诉求,将资本的触角伸向一切可以获取利益的地方,通过开辟殖民地大肆掠夺生产原料和消费市场,将生产和消费的领域扩展到全球任何一个可以带来利益的国家和地区,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正义话语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批判可谓入木三分,然而,由于其自身的软弱,身处强大的资本主义制度支配权力之下,始终停留在话语层面。由此,实现资本主义制度及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之上的生态价值观的双重变革,难以迈进实践变革的步伐。

三、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生态正义话语的导向

从上述西方关于生态正义话语的分野可以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反对普适的和永恒的规范正义观,但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限度内接受了社会主义正义观”^[12]。因此,学术界有必要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结合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和实践,汲取西方社会符合现实状况的生态正义话语,形成一种超越阶层和政治意识形态,拥有最大包容性,能够被世界所广泛认同、接受、遵循的生态正义话语体系。

(一) 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

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含有丰富的生态思想。马克思曾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自然“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3](P95)},在他看来,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统一关系。一方面,相对于人,自然具有优先性。人要生存与发展,首先必须要满足吃、穿、住、行等各方面的需要,而这些生活资料的直接或间接来源是自然。另一方面,相对于自然来说,人具有主

动性和创造性。从人类社会产生开始,自然就被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从这个意义上来看,自然又是人化的自然,是内含人的本质力量的自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始终在发生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的双向运动。在马克思看来,人类社会历史也是“人的实践不断生成的过程,这种历史生成论意味着社会历史主体与社会历史客体形成与发展是同一历史过程”^[14],从而完全消解了近代哲学在自然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主客体之间的对立,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理论在新时代的发展,内涵着生态正义话语。著名的“两山论”,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论,正是在吸收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理论的基础上提出的。“两山论”主张保护自然和经济发展的双赢,建构人与自然之间的现代和谐关系。在新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就是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二) 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态需求

纵观社会历史,人们从解决温饱到期盼环保,从要求生存到要求生态和谐,对良好生态环境的需要不断增长。生态正义话语要导向人民群众的生态需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反映人民群众对良好生产生活环境的需求,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逐步地解决突出的环境问题,创造优美的生态环境。人是现实社会中具体的人,因经济、政治、社会地位、文化教育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人对生态环境的需求不同。生态正义话语要充分考虑这些不同的生态需求,融合其中共有的生态需求于话语体系之中。为此,生态正义话语必然要充分表达不同群体、不同地区的生态需求,考虑后代人生存发展对生态环境的要求;必然要统筹不同群体、不同区域、不同代际的利益,调动人们积极地参与到生态环境的建设与保护中;必然要激励全体人民群众共同合作建设良好生态环境,发挥各自的优势,整合集体的力量解决生态问题,为生态环境保护做出贡献。

(三) 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的平衡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内在要求,是人类永续发展的基础。生态正义话语要导向维护生态系统的整体性,既兼顾自然的价值,维护人与自然的正义,也兼顾具体的人的需求,维护社会正义,从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角度倡导保护自然,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生态正义话语还要导向“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这是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5](P49)}。马克思说,“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只会带来灾难”^{[16](P452)}。生态正义话语要体现只有遵循自然规律,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才能够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的长久性。否则,人类对生态的破坏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

(四)倡导生态权利和义务的公正

生态正义话语要导向彰显生态权利与义务的公正。其一,就人与自然生态之间的关系而言,人类有从自然界获取生活必需品的权利,相对的就要承担维护自然生态不被破坏、保护自然的义务,且利用的程度要在环境承载能力的范围之内。其二,有差异的主体在生态权利与义务方面的公正。利用自然来满足生存需要是人们普遍的方式,但利用自然是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还是满足欲望的需要有着根本的不同。生态正义话语要着眼于现实中不同主体实际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差异,导向生态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享用的生态权利越多,就应该付出越多的生态义务。在全球范围内,发达国家消耗更多的全球资源,就应当承担起更大的生态责任。坚持共同而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倡导发达国家通过技术与资金的方式援助欠发达地区进行生态环境的保护;倡导国际合作,支持各个国家、地区参与到全球生态治理的国际公约中,共同努力建设美丽的地球。

(五)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为应对全球性问题而提出的中国方案,是指导解决全球性问题的理论基础。生态环境问题复杂多样,越是如气候变暖、物种减少这些重大的生态环境问题,越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关注与合力解决。生态正义话语须导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习近平 2017 年 1 月 18 日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呼吁世界人民共同奋斗,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导下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7](P521)}。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就是立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而形成的全球生态治理观。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的发起者,也作为全球生态治理观的提出者,中国在应对世界性生态问题上表现出了强有力的担

当。相较于西方社会碎片化的生态正义话语,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高度的生态正义话语更具系统性、整体性的特征,因而效果也更为显著。

构建生态正义话语,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立足人类命运共同的高度,满足人们的美好生态需求,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倡导生态权利和义务的公正。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导向下的生态正义话语,必将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和认同,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人类文明的发展。

参考文献:

[1]潘家华,高世楫,等.美丽中国:新中国 70 年 70 人论生态文明建设(上册)[M].北京:中国环境出版集团,2019.

[2](美)雷切尔·卡森.寂静的春天[M].韩正,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9.

[3]王韬洋.“环境正义”——当代环境伦理发展的现实趋势[J].浙江学刊,2002(5).

[4]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5]王顺玲.生态伦理及生态伦理教育研究[D].北京交通大学,2013.

[6]钱俊生,余谋昌.生态哲学[M].北京:中央党校出版社,2004.

[7]孙正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正意义[J].哲学研究,2007(9).

[8]王雨辰.生态文明思想源流与当代中国生态文明思想[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9.

[9](美)彼得·S.温茨.环境正义论[M].刘丹琼,宋玉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10]高国荣.美国环境正义运动的起源、发展即影响[J].史学月刊,2011(11).

[11](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

[12]林育川.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规范正义——一种可能的马克思主义正义理论[J].哲学研究,2008(8).

[1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4]王雨辰.论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理论及其当代价值[J].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1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1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1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肖芬蓉 E-mail:simple5222@163.com